

人文科学研究丛书

文化发展论

许明
花建◆主编

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什么？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理念和方式是什么？我们自觉认识到，我们处在中国文化第二次转型的起始阶段，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我们需要获得文化自觉和某种历史感。我们且把本书作为我们对中国文化第二次历史转型的一种祷告。



WENHUA
FAZHANL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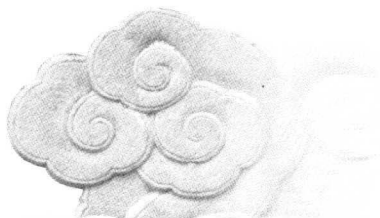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文化发展论

许明 花建 ◆ 主 编

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什么？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理念和方式是什么？我们自觉认识到：我们处在中国文化第二次转型的起始阶段，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我们需要获得文化自觉和某种历史感。我们且把本书作为我们对中国文化第二次历史转型的一种祷告。



WENHUA
FAZHANLU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发展论/许明,花建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
ISBN 7-301-09388-8

I. 文… II. ①许… ②花… III. 文化-研究-世界 IV. G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9896 号

书 名:文化发展论

著作责任者:许 明 花 建 主编

责任编辑:黄 皓 王业龙

标准书号:ISBN 7-301-09388-8/G·1573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7

电 子 信 箱:pl@pup.pku.edu.cn

排 版 者: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82350640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A5 13.125 印张 353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目 录

导论 文化发展的理念和中国文化发展之我见	(1)
----------------------------	-----

第一编 文化发展轨迹论

第一章 世界文化发展的概貌	(41)
第一节 文化发展理论溯源	(41)
第二节 “轴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66)
第二章 文化发展的特征	(86)
第一节 稳定性和时代性	(87)
第二节 整体性和差异性	(94)
第三节 先进性和落后性	(104)
第四节 常态和危机	(114)
第三章 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与特点	(127)
第一节 华夏文明的奠基与元典创制	(127)
第二节 帝国王朝的盛衰与东方气象	(148)
第三节 少年中国的成长与文化涅槃	(163)

第二编 文化发展结构论

第四章 文化发展的动因	(177)
第一节 通向文化发展结构的路径	(177)

第二节	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因及其结构	(191)
第三节	文化发展结构中的文化转型问题	(211)
第五章	文化发展中的矛盾与冲突	(220)
第一节	内结构性冲突	(220)
第二节	外结构性冲突	(234)
第三节	转型时期中国的文化矛盾	(253)
第六章	文化发展的表层和深层	(270)
第一节	文化发展的表层结构	(270)
第二节	文化发展的深层结构	(282)
第三节	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深层追问	(296)

第三编 中国文化发展战略论

第七章	文化发展的自觉与远见	(311)
第一节	文化自觉的理性精神	(311)
第二节	从大众的自觉到精英的远见	(320)
第三节	文化发展的战略设计	(328)
第八章	文化发展与文化创新	(351)
第一节	文化创新的动力机制	(351)
第二节	文化发展的活力之源	(363)
第三节	中国文化的创新之路	(372)
第九章	文化的体制和改革	(380)
第一节	文化发展的体制化	(380)
第二节	文化体制的变革规律	(390)
第三节	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	(399)
结语	文化发展与 21 世纪中国和平崛起	(408)
主编后记		(416)

导论 文化发展的理念和中国 文化发展之我见

(一)

关于“文化”的论著,已经是汗牛充栋、读不胜读了。事实上,只有具体的“文化”,而没有抽象的、一般的“文化”。谈论“一般文化”,往往是出力不讨好的。事实也恰恰是,关于“文化概论”、“文化论”之类的原理性著作,往往陷入大同小异、概念空洞的陷阱而不能自拔。然而,我们这次做的事情,恰恰就是讲“原理”的,是研究“文化发展”的。

当然,我们是有理由的。新时期二十多年来,关于“文化发展”的研究,迄今没有一部完整的专著,甚至连论文也所见极少。我们要讲的“文化发展”,不是讲一般的文化史。讲文化史的专著,已经数不胜数了。我们研究的重点在“发展”。不仅是“发展”,而且还要“论”。也就是说,我们是想专门研究关于文化的发展规律。

这个题目的可靠性如何呢?首先,过去的文化研究,描述“发展”的多,而研究发展的少;描写具体文化门类发展的多,而研究大文化演化发展规律的少。这好像一个进入深山老林的旅游者,一头扎进小路小径而无法通过地图或站在高处观看全貌。就文化而言,通过这个门类与那个门类的比较,这个时代与那个时代的比较,都可以从中发现总体文化发展的内在脉络,令你由于有了全局而对局部更加了解。

研究文化的发展,就不得不回到抽象、再抽象。只有高高在上,才能触摸本质;只有跳出具体而又繁杂的文化现象,才能达到整体从而把握“具体”。

我们将文化发展之流比作发源于青藏高原而奔泻于千山万壑间的黄河长江,其九曲十弯可以比作文化发展的艰难曲折,但其奔泻而下直入大海的趋势,是势不可挡的。它的特征就是向前,向前,所以,才有“发展”这一研究对象的存在。

人类思想史资料表明,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开始(也包括中国先秦时期),人类就有了关于“发展”的丰富论述。苏格拉底认为,世界万物发展的原因,是整个宇宙中的合目的性原理。而柏拉图认为,宇宙的生长过程,就是神运用理念规定物质和物质模仿理念的过程,也是自然界从混沌杂乱到清晰并转为人们所认识的过程。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在事物的发展中,“形式”是积极的、能动的,是动力之源。^①

恩格斯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论述: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从头做起。^②

一个时代,把古代文明“一扫而光”以便从头做起,把“文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发展”表达得淋漓尽致。

当然,历史已经表明,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如此看待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德国文化哲学家斯宾格勒(Qswald Spengler, 1880—1936)就认为,历史学不是研究连续的进步,而是比较不同类型的文化模式。他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认为,世界历史上有八种自成体系的伟大文化,即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墨西哥的玛雅文化、西亚和北非的伊斯兰文化和西欧文化。

① 参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3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0页。

每种文化都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并自成体系地形成发展脉络。但是,斯宾格勒并不重视各种文化的发展脉络,而是过分强调了八种不同的文化模式的比较特点。而在文化发展的研究上,他持有的终结论和宿命论的历史观,反映了德国黠武主义在军事冒险失败后的绝望心理和没落情绪。

当然,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 1889—1975)对文化史也持“发展”的态度,但他对“发展”的内在的机理却持有明显的“英雄创世论”。他称“富有创造力的少数人”是文明发展的动力,这部分人满怀“生命的激情”,带领“怠惰的多数人”以“挑战与应对”的法则行事,这种“挑战与应对”的状况决定着文明的特征与生命力。这种根本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相对立的历史—文化发展观,在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1887—1948)、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 1864—1920)等人那里也表达得十分明显。特别是后者,坚决不同意人类文明都是从“原始阶段”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高级阶段”这种历史进化论。他断定,整个历史实际上没有高低之分,只能依据其自身的标准和价值,而不是观察者的价值来进行评判。

中国历代思想家用中国哲学的语言表达了他们对文化与历史发展的看法。古代中国的思想家们用“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①这样简洁明了的语言来表达世界万物变化发展的观点;其中,王夫之对历史进化的思想表达得极为完整,他在《读通鉴论》卷二十中说:“三代沿上古指缝间,国小而君多,……而暴君横取,无异于今川、广之土司,衣百结而食草木。”根据这样的事实,他对历史发展形成了变化、发展、进化的朴素实在的看法。王夫之说,“变化日新”,“荣枯代谢而弥见其新”^②,其锐利而明确的历史判断,令人叹服。

① 《老子》第六十四章。

②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大易》。

对近代中国产生最广泛影响的历史思想是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它宣传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后来流传至广被近代中国思想界广为接受的“物竞天择”就源于此，它成为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和社会改造浪潮的精神动力。

“文化发展”成为一个研究对象，如上所述，是有思想史的根据的。即使是斯宾格勒，他的末世主义哲学也没有能够掩盖“文化发展”这一事实。当然，我们这里讲的发展不是呈线型的一味从低到高的行程，它的高不可及的顶峰状态，恰恰不是历史性地存在的，如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文化，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欧洲15—18世纪的文艺复兴，以及中国的宋明理学达到的学术水准，都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出现的文化高峰，这是发展中的特殊，是值得研究的历史关节点。

将“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是个全新的学术研究课题。从宏观上观察“文化发展”之流，最重要的是把握和分析这个发展之流的整体特征。这对于没有借鉴的研究来讲，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上面我们分析过，斯宾格勒、汤因比、本尼迪克特等西方文化史大家，也只是分析了文化发展的静态特征。如斯宾格勒描述性地把文化类型分成为“春、夏、秋、冬”四个阶段，又用“前文化时期、文化时期、文明时期”来阐述它的阶段性质。无论怎样雄辩，他的论述是表面的，而不是深入肌里的。而汤因比使用了与斯宾格勒相同的办法——现象归纳法，将世界上的文化划分成12种文化类型，并企图勾画出“局部文明循环论”的理论框架。本尼迪克特用“有机整体”这样的术语来描述文化结构的整体特征，比之前两位，已有了更多的思想性和方法论性质。她在《菊花与军刀——日本文化模式研究》一书中，就运用这种方法而将文化有机地融合进去。

这些西方文化学者企图对文化史作整体特征描述时，恰恰缺少了从各主要因素的辩证关系着手分析的角度。在人文研究中，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学术摒弃马克思主义传统已成为一种潮流，所以，马克思主义所操持的辩证法，这些西方学者是不熟悉也是不会

主动加以运用的。我们这里所使用的方法,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中最常见和常用的方法:在对立统一之中寻求各关联要素的联系。

通常我们谈文化特征往往侧重于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民族性包含在时代性内容之中,时代性亦包含在民族性内容之中。然而,民族性与时代性分别是从空间与时间两个不同的维度对文化发展特征的概括,无法全面反映出文化发展的特征。要认识文化发展的特征,必须从不同的视野全面把握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点,从空间、时间两个维度并结合文化自身的结构、文化领域与其他社会领域的关系、此文化与他文化的关系来综合考虑。如此看来,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至少呈现四大特点:从空间维度,从文化自身的结构以及此文化与他文化的关系、文化领域或其他领域的关系来看,表现出整体性与差异性以及先进性和落后性的特点;从时间维度来看,文化发展历史的过程体现为稳定性与时代性的特点,而其发展的形态则呈现出常态性和危机性的特点。

从时空的维度展开文化发展的整体性与差异性、先进性与落后性、稳定性与时代性、常态性和危机性的矛盾关系分析,是文化发展分析的“抓牛鼻子”,是研究所使用的如同康德的十二基本范畴。这些范畴本身的存在是一种客观事实,并且涵盖了所有文化现象和文化发展过程。

文化发展特性的“四矛盾论”,仍是文化发展的外在表象,当然,这种表象是有机相连的,是具有普适性的。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与特点来看,可以证实这些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本书除了阐明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关系外,还以中国文化发展的具体特征为实例,描绘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径,剖析了这个过程所包含的矛盾性和矛盾运动过程。“四矛盾说”在这里淋漓尽致地得到了展示。

(二)

华夏文明八千余年,从凿石为斧的初级加工工具阶段,到精镂细刻的宫廷艺术,文化不仅延绵有序地发展,而且其发展呈现出某种自在的规律性。

从旧石器时代到夏商之际是华夏文化的一个发轫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华各民族的文化意识开始形成。距今约一万八千多年前,山顶洞人就打造出了造型均匀规整、磨制光滑的石制工具,已有了被考古学家称为“装饰品”的小砾石、石珠、贝壳等。它们之中有的被赤铁矿粉染红,呈现红色。最初的美感已在原始人类的生活实践中出现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报告表明:在世界各地的史前文化中,都有形式和功能相同的原始舞蹈和原始绘画。^①而分布更广的史前岩画,从广西左江和云南苍源到新疆、内蒙古的北方山区都有生动而丰富的展示。

经历了最初的自由活泼的艺术想像阶段,经过夏商之际的过渡,终于,以先秦的人文伦理价值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形成了自己的框架。以德为本,美善一体,周初的“天命观”给秦汉之际的人文发展开辟了历史路程,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尚书·多士》中说:“自成汤至于帝乙,因不明德恤祀,亦惟表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②在周初的文诰里,一个反复吟诵的主题就是敬德。从敬王而敬德,自周开始,华夏文化的眼光已转向“人事”而非鬼神,而从这一标准出发,衡量人格美的标准,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由人格而至教化,由教化而至礼乐有序,终于形成一种以血缘伦理为核心,以“敬德”为内容的人伦精神,并成为稳定的“尊卑、男女、老幼”这一“亘古不变的观念”为基础的社会机制。

^① 参见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页。

^② 《尚书今古文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0页。

华夏文化精神发展,魏晋是一个特殊的转换阶段。鲁迅曾以“文学的自觉”来概括汉末魏初的文化气质,因为这个时代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即“诗赋不必寓教训”的主张,使文化精神从道德和政治的羁绊中解脱出来。魏晋的美学风格,成为“几百年间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思想上大自由的时期”^①。

从文化精神的发展看,魏晋时期是华夏文化精神真正的成熟期——它使美与道德从属的关系疏远并形成了自己的属性和品格。在社会动荡不安、统一政权不复存在的魏晋时期,文化艺术和学术学业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自身的尊严和个性,在这种环境里,文人学者可以直抒胸臆而不必小心翼翼地揣摩“上意”,将自己的真情实感隐藏起来,这就是鲁迅先生十分赞赏的“尚通脱”,即可以写出想说什么便说什么的文章^②。

这种个性化的精神自由,经过郭象“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的阐释,成为“独化于玄冥之境”^③的独立自足的文化品格,所谓《六经》礼乐本求致用,《庄》、《老》清谈则务于自娱,标志着价值取向由尊奉礼法传统的“致用”型向超越现实名教的士族“自娱”型的转化,这是把握魏晋时期文化精神的基本立足点。

自隋唐至两宋,是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大一统的文化发展阶段,也即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文化转型之后的“文明成熟期”。在这一阶段,文化理念基本成熟,文化发展与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经济发展交相辉映,终于走向它的顶峰期。

灿烂和绚丽始于精神的解放和文化的开放。唐朝便是这样一个文化开明、个性发展鲜明的时代。唐太宗奉行开明政策,形成道、佛、儒三教并行的壮观景象,人们不以一教为尊,不以一说为准,可以自由讨论,自由发表意见。所以,有唐一代的艺术,个性鲜明,审美风格

①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② 见郭象:《〈庄子〉序》和《齐物论注》。

③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00页。

千姿百态,自由奔放,形成极为壮观的气象。试看苏轼的《正月十五夜》诗:“火树银花台,星桥铁锁开。晴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妓皆秣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诗人笔下的上元节之夜,何等热闹,何等辉煌。满街灯火和天上星月相辉映,游人如织,连森严的官禁也显得那么有人情味。唐长安城的人们于正月十五的灯节竞相奔走,观赏争奇斗艳的各式花灯。正所谓“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玉辇满街衢”。这是世俗社会的文化风景,也是我国历史上诗的鼎盛时期的一个写照。诗人们用秀丽而富于色彩的诗句描绘出了这个诗情勃发的时代风貌。

犹如一曲交响乐热烈而又奔放的主题曲,唐代的文体精神是高潮迭起的主旋律,而作为一个稳定而漫长的封建时代的文化理念成熟与沉淀,两宋则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在高潮的热烈之后,它是沉静的、反思的、安静的,甚至是忧郁的。综观两宋时代的诗、词、文、工、建筑、绘画,无一不是精细而又巧妙的。不说宋代的细致入微的工笔画,单说陶瓷史上的“汝、官、柴、定、钧”五大名窑烧出的青瓷、白瓷,以其盖世无双的绮丽,成为中国工艺史上的奇葩和绝唱。

元明清三代是传统社会走向衰退最后由现代社会及其文化取而代之的时期。与热烈的盛唐文化和精细的两宋文化相比,元明清三代的文化发展具有鲜明的转折特征。用“新旧嬗递”一语来概括这个转折也许“太现代”,但自元明以降,中国社会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掌握全国政权百余年之久。由于整整八百年的科举停废,摧毁了传统文化与国家体制之间的整合关系,知识分子群体性地成为社会上最为人所不齿的阶层之一。这些被阻隔在统治体制之外、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的知识分子,无力也无心于遣兴自娱,用字雅正、音律协调的宋词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不复存在。元代知识分子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浸润于民间文化资源之中,开启了精致文化向市井乡俗文化转移的过程。而明代以降出现的工商市俗社会的兴起,又使这一过程成为一种历史化的趋势,使中国历史上最为成熟的封建社会中的文化创造,总体上成为“残阳

如血”的咏叹。它既缺少了先秦文化原创性的狰狞之美,又缺少大汉雄浑、大唐绚彩的洒脱大气之势,也缺少作为精致至极的两宋文化的雅秀之美。但它却是从古代向近代的真正的过渡,是清丽高雅向市俗文化的实质性的演化。随着明初永宣两朝对艺术创造精致化要求的短暂的高潮,很快,在明中叶正德、嘉靖以后,社会风气在商品经济和市民文化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靡然向奢,以俭为鄙”^①,文化风尚开始追求感官刺激,奢靡成风,违禁逾制,求新求变。明中叶以后出现的“话本”“小说”,以及在器物造型上的洒脱随意,千姿百态,都充分体现了这种时代风貌的变化。

有清一代满族入主以后,有满汉文化交融的一个过程,但市民文化的发展却再也无法中断,即使是康、雍、乾三朝的鼎盛时期,以民间文化发展为特征的地方戏大量形成,在全部 317 种剧种中,有 200 种形成于清朝前期。戏楼、茶园遍布各地,徽商、晋商四处活动,传奇作者有姓名可考的有数百人,作品近千部。灯彩、狮舞杂剧繁荣昌盛,形成了兴旺发达的民间文化景观,显露了它的不可逆转的近代化进程。清末民初,这一过程已经进入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之中,社会生活的结构性变化已经使文化图景焕然一新,20 世纪中国文化发展已进入一个实现“现代性中国”的历史进程之中。

(三)

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文化活动的地域特征?这当然要做具体的研究才能确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分野是存在的,并且像个不平行的放射角那样,出现越来越大的分野,直至形成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是什么原因使原先基本相似的文化活动出现了不同形式和风格的分野呢?作为文化学中的历史地理学派的代表,美国学者弗朗兹·博尼斯(Franz Boas, 1858—1942)及其学生本尼迪克特认为,各民

^① 顾炎武:《肇城志》。

族并非遵循同一路线进化,处于不同地理环境的各个文化都有独特的历史过程。他们认为一个群体的文化是社会遗产的组合与总体,由于群体的历史与种族的气质而获得特别的意义。文化,“受到历史—地理因素的塑造”^①。文化研究中的传播学派、进化论学派、符号文化学派的观点,虽然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论及与分析了文化形成与传播的机理,但它们都无法不承认历史—地理学派所提出的基本假设:处于不同地理环境的各个文化都有独特的历史过程。这是因为:文化是一个在特定的空间发展起来的历史范畴,世界上不存在超越时空的文化生成。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逐渐形成各具不同风格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培育了各种文化类型。同一民族又因生活环境的变迁形成自身的变化规律,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不同的文化,前者是文化的民族性,后者是文化的时代性。所以,文化发展研究必须从孕育、滋养文化与某种风尚的自然—社会条件入手,了解并分析形成某种文化精神形成的自然前提与产生它的物质基础。

我们对中国文化进行史前文化的考察时,不能不考察到一个文化生成的自然物质前提。第一块打制石器是全世界相同的,然而,在什么条件下出现了不同的原始陶器呢?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前460—前377)所著《论气、水和环境的影响》一书认为,人的身体和性格大部分随着自然环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文艺复兴晚期学者、法国人让·博丹(1530—1596)认为,某个民族的心理特点决定于这个民族赖以发展的自然条件的总和。18世纪的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则认为,国家制度和文化类型取决于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他认为,异常炎热的气候有损人的力量和勇气,居住在炎热天气下的民族柔性懦弱,必定引导他们落到奴隶的地位。而寒冷的气候则赋予人们的精神和肉体以力量,这种力量和勇气使他们能够从事持续的、艰难的、伟大的和

^① 转引自冯天瑜等:《中国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勇敢的行动,使他们保持住自由状态。

当然,我这里引用这样的论点,并不是全然地肯定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对人类文化的发展进行综合研究才能科学地揭示出它的内在规律,但当主体的生成还处在十分初始阶段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认同环境的决定性影响,传播学派、进化论学派等都不能解释文化发展的起源和分化,原因在于:它们把主体的生理、心理素质看成是一个先天的存在,这显然是与历史发展的事实相违背的。

因此,我们不得不转向重视“主体—环境”相互关系的“文化生态论”的观点上去。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 1955 年出版的《文化变迁理论》一书阐述了文化生态学的基本概念。该书指出:“生态学主要的意义是对环境之适应,对大多数动物而言,适应是以它们的身体特征来达成,而人类的适应主要是靠文化的方式来达成。”“人类进到生态的场景中……不仅只是以他的身体特征来与其他有机体发生关系的另一个有机体而已。他引入了文化的超机体因素。”^①

文化生态的观点引导我们从文化生成与发展的现实场景中去理解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因。人类文化发展的生态环境,是自然环境、生产活动和社会组织三个层次的组合。这三个层次的组合,决定了中华民族社会心理诸特征。根据这三个特征,我国有的学者将中华文化生态与西欧文化生态作了对比。而其中原初的差异是:中华文化生态由半封闭的大河大陆型萌生;而西欧文化生态自开放的海洋型萌生。

半封闭的大河大陆型生存环境,大致上决定了中华文化生态圈的发展方向。通过生产方式、社会制度以及随之形成的文化形态,形成了其不同但内涵相关的样式。

从大文化史的角度看,文化发展的逻辑特色是文化的自我保存和生命代谢。从史前文化开始历经五千年的发展,中华文化形成今天这个样子,“发展和进步”概念是它的逻辑特征的概括。一些文化

① 转引自:《人与文化的理念》,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14 页。

史著作停留在以归纳的结论描绘历史面貌本身上,而缺少历史哲学和历史逻辑学的思考。当我们询问发展的原因时,这是一些历史著作所能做到的;但当我们试图回答为什么是这样的发展而不是那样的发展时,不少的历史著作则往往逃避了这个问题。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发展史,显而易见的,史前、先秦、两汉、魏晋、唐宋元明清直至近代经历了一个变化和丰富的历史过程,它的发展特性是无可逃避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而广之是历史的发展问题,小而言之是文化的发展的理论问题,不能不是我们这部著作所要回答的^①。

要言之,我们不仅要描绘文化精神的面貌,而且要研究和说明文化为什么这样发展而不是那样发展,它们之间的过渡是什么,其中的逻辑特性究竟是怎样的,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种过渡或那种过渡。笔者以为,这都是应该在本书解决的问题。

当代历史寻求精神变更的逻辑特征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一个社会文化精神的确立和变化究竟由什么因素来决定?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又是什么?什么因素的变化才决定了一个社会整体精神的变化?

我们上文说明,首先是地理环境决定一种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向。因为自然环境首先决定了人这种生物形成的基本素质。北方民族与南方民族在人种上的区别是个最显著的例子。而“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地理环境的差异性、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它造成各地域、各民族物质生产方式和不同类型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温带农业文明的稳定持重,与江河灌溉造成居民农耕生

^① 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这样展现中华文化历程:史前时期——中华文化的多元发生;殷商西周——从神本走向人本;春秋战国——“轴心时代”;秦汉——一统的帝国与统一的文化;魏晋南北朝——乱世中的文化多元走向;隋唐——隆盛时代;两宋——内存、精致趋向与市井文化的勃兴;辽夏金元——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明——沉着与开放;清——烂熟与式微;近代——蜕变与新生。